



# 包身工

夏衍 著

# 包身工

夏衍 著

周人俊 繪圖

工 人 出 版 社

1964年·北京

---

封面設計 周人俊

包 身 工

夏 衍 著

周人俊 繪圖

\*

工人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寧門外六鋪炕)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09 号

人民教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經售

\*

开本: 787×1092 1/36

字数: 20,000 字 印张: 1 7/36 印数: 1—81,000 (累) 426,000

195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64 年 4 月北京第 6 次印刷

\*

統一書号: 10007·71

定价: 0.10 元

# 目 录

包身工..... 1

“包身工”余話.....27

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42

## 包 身 工

已經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一刻，曉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鋪里的人們已經在蠕动了。

“拆鋪啦！起来。”

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皮衫褲\*的男子，像生气似地叫喊。

“蘆柴棒！去燒火，媽的，还躺着，猪彘！”

七尺闊，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橫七豎八地躺滿了十六七个“猪彘”。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滿了汗臭、糞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她們很快地就像被攪动了的蜂窝一般地騷动起来。打伸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錯了別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別人身上，在离开

---

\* 拷皮衫褲，拷綢褲褂。

別人頭部不到一尺的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覺，在這些被叫做“豬糞”的人們中間似乎已經很鈍感了。半裸體的起來開門，拎着褲子爭奪馬桶，將身體稍稍背轉一下就會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換衣服。

那男人虎虎地向起身得慢一點的女人們身上踢了幾腳，回轉身來站在不滿二尺闊的樓梯上，向樓上的另一群人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來？懶虫！等太陽上山嗎？”

蓬頭，赤腳，一邊扣着鈕扣，幾個睡眼惺松的“懶虫”從樓上沖下來了，自來水龍頭邊擠滿了人，用手捧些水來澆在臉上；“蘆柴棒”着急地要將大鍋里的稀飯燒滾，但是倒冒出來的青煙引起了她一陣猛烈的咳嗽。十五六歲，除出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蘆棒梗一樣，於是大家就拿蘆柴棒當作了她的名字。

這是楊樹浦福臨路東洋紗廠的工房。長方形的，用紅磚牆嚴密地封鎖着的工房區域，被一條水門汀的街堂馬路劃成狹長的兩塊。像鴿子籠一般的分割得很均勻。每邊八排，每排五戶，一共是八十戶一樓一底的

房屋。每間工房的樓上樓下，平均住宿着三十三个被老板們所指罵的“懶虫”和“猪糞”，所以，除出“帶工”老板\*、老板娘、他們的家族亲戚，和那穿拷皮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請願警\*\*，……之外，这工房区域的牆圈里还住着二千个左右穿着破烂衣服而專替別人制造衣料的“猪糞”。

但是，她們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們的身体，已經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給了叫做“帶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东洋厂里有“脚路”\*\*\*的帶工，就亲身或者派人到他們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們多年熟練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講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說那些无力“飼养”可又不忍讓他們兒女餓死的同乡。

“还用說，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魚肉葷腥，一个月休息两天，咱們帶着到馬路上去玩玩，嘿，几十層楼的高房子，兩層楼的汽車，各种各样，好看好玩

---

\* “帶工”老板：管理包身工的工头。

\*\* 請願警：旧社会有錢的人为了安全、出錢向反动政府雇用的警察，也就是“保鏢的”。

\*\*\* 脚路：就是門路。

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見識一下啊。

“做滿三年，以后賺的錢就归你啦，塊把錢一天的工錢，嘿，別人跟我叩了头也不替她写进去！咱們是同乡，有交情。

“交給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二錯，我还能回家乡嗎？”

这样說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說，就是她們的父母也会怨悔自己沒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預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上一个十字，包身費一般是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內，由带工的供給住食，介紹工作，賺錢归带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銀两訖，“恐后无憑，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隶属在五十个以上的带工头手下，她們是順从地替“带工”賺錢的“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們的手面\*和财产。少一点的三十五十，多一点的带到一百五十个以上。手面寬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債，

---

\* 手面，排場的意思。



买田，起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髮鋪一类的买卖。

东洋厂家将这些紅磚墙圍着的工房以每月五元的代价租給“带工”，“带工”就在这鸽子籠一般的“洋式”楼房里装进三十几部沒有固定車脚的活动机器。这种工房沒有普通衙堂房子一般的“前門”，它們的前門恰和普通房子的后門一样。每扇前門檻上，一律釘着一塊三寸長的木牌，上面用东洋笔法的汉字写着：“陈永田泰州”“許富达維揚”等等带工头的籍貫和名字。門上，大大小小地貼着褪了色的紅紙春联，中間，大都是紅紙剪的元宝、如意、八卦，或者木版印的“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圖像。春联的文字，大都是“积德前程远”“存仁后步寬”之类。这些春联貼在这种地方，好像是在对別人驕傲，又像是在对自己諷刺。

四点半之后，当沒有影子和綫条的晨光胆怯地显现出来的时候，水門汀路上和衙堂里，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滿了。凉爽而帶有一点湿气的朝風，大約就是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气里的人們仅有的天惠。她們嘈杂起来；有的在公共自来水龙头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拗执地粘在她們头髮上的棉絮。陸續地、两个一組两个一組地用扁担抬着平滿的

馬桶，吆喝着從人們身邊擦過。帶工“老板”或者打雜的拿着一疊疊的“打印子簿子”，懶散地站在正門出口——好像火車站軋票處一般的木柵子前面。樓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類收拾掉之後，晚上倒掛在牆壁上的兩張板桌放下來了。十幾只碗，一把竹筷，胡亂地放在桌上，輪值燒稀飯的將一洋鉛桶漿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的中央。她們的定食是兩粥一飯，早晚吃粥，中午乾飯。中午的飯和晚上的粥，由老板差人給她們送進工廠里去。粥，它的成分可並不和一般通用的意義一樣。裡面是較少的粳米、鍋焦、碎米，和較多的鄉下人用來餵豬的豆腐的渣粕！粥菜，這是不可能的事了，有幾個“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場去收集一些萵苣菜的葉瓣，用鹽滷漬一浸，這就是她們難得的佳肴。

只有兩條板凳，——其實，即使有更多的板凳，這屋子裡面也沒有同時容納三十個人吃粥的地位，她們一窩蜂地搶一般地各人盛了一碗，歪著頭用舌頭舐著淋漓在碗邊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門口。添粥的機會，除出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發工錢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輪着揩地板，倒馬桶的日子，也有連一碗也輪不到



洋鉛桶空了，輪不到威第一碗的人們還捧着一只空碗……

的时候。洋鉛桶空了，輪不到盛第一碗的人們还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鉛桶，到鍋子里去刮下一些鍋焦、殘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上一些冷水，用她那双方才在梳头的油手攪拌一下，气烘烘地放在这些廉价的、不需要更多“維持費”的“机器”們的前面。

“死懶！躺着死不起来，活該！”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顧正紅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战争之后，东洋厂家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增加起来。据说，这是一种極合經營原則和經濟原理的方法。有括弧的机器，終究还是血肉构成的人类。所以当他們忍耐到超过了最大限度的时候，他們往往会很自然地想起一种久已遺忘了的人类所該有的力量。有时候，愚蠢的“奴隶”会体会到一束箭折不断的理論，再消極一点他們也还可以拚着餓死不干。此外，产业工人的“流动性”，这是近代工业經營最嫌恶的条件，但是，他們是决不肯追寻造成“流动性”的根源的。一个有殖民地人事經驗的自称是“溫

---

\* 顧正紅事件：一九二五年五月間，上海日本内外棉紗厂的資本家鎮压工人罢工，槍杀罢工运动的工人領袖共产党员顧正紅，造成“五卅”慘案。

情主义者”的日本人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說：“在这次爭議(五卅)中，警察力沒有任何的威权。在民众的結合力前面，什么权力都是不中用了！”可是，結論呢？用溫情主义嗎？不，不！他們所采用的，只是用廉价而沒有“結合力”的“包身工”来代替“外头工人”（普通的自由劳动者）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屬於帶工的老板的，所以她們根本就沒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們每天的工資就是老板的利潤，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子，或者冷水来强制她們去做工。就拿上面講到过的蘆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事倒是每个包身工都有遭遇的机会）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蘆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風而躺在床(?)上了。她們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時間是非讓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一天，蘆柴棒可真的不能掙起来了，她很見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縮做一团，尽可能的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这种工房里生病躺着休养的例子，是不能任你开的。很快的一个打杂的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帶工头的亲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

“白相人”\*，所以在这种地方他們差不多有生杀自由的权利。蘆柴棒的喉嚨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身体沒力，請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給你医！”

一手抓住了頭髮，狠命地举起往地上一摔，蘆柴棒手脚着地，打杂的跟上去就是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脚是不会少的，可是打杂的很快地就停止了，后来据說，那是因为蘆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足趾！打杂的恼了，順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头潑在蘆柴棒的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風。蘆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潑，反射地跳起来，于是在門口擦牙的老板娘笑了：

“瞧！还不是假病！好好的会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这只是常有的例子的一个。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她們大半都是老板的乡邻，这一点，在“管理”上是極有利的条件。厂家除出在工房周圍造一条圍牆，門房里置一个請願

---

\* 白相人：流氓。

警，和門外釘一塊“工房重地，閑人莫入”的木牌，使這些“乡下小姑娘”和別的世界隔絕之外，將管理權完全交給了帶工的老板。這樣，早晨五點鐘由打雜的或者老板自己送進工廠，晚上六點鐘接領回來，她們就永沒有和“外頭人”接觸的機會。所以，包身工是一種“罐裝的勞動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絕沒有因為和空氣接觸而起變化的危險。

第三，那當然是工價的低廉。包身工由“帶工”帶進廠里，於是她們的集合名詞又變了，在廠方，她們叫做“試驗工”或者“養成工”。試驗工的期間表示了廠家在試驗你有沒有工作的能力，養成工的期間那就表示了準備將一個“生手”養成為一個“熟手”。最初的工錢是每天十二小時，大洋一角乃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範圍是不需要任何技術的掃地、開花衣、扛原棉、松花衣之類，幾個禮拜之后就調到鋼絲車間、條子間、粗紗間去工作。在這種工廠所有者的本國，拆包間、彈花間、鋼絲車間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上海，他們就不必顧慮到“社會的糾纏”和“官廳的監督”，就將這種不是女性所能擔任的工作，加到工資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們身上去了。

五點鐘，第一回聲很有勁地叫了。紅磚罐頭的蓋子——那扇鐵門一推開，就像放鷄鴨一般地無秩序地沖出一大群沒鎖煉的奴隸。每人手里拿一本打印子的簿子，不很講話，即使講話也沒有什麼生氣。一出門，這人的河流就分開了，第一廠的朝東，二、三、五、六廠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們就和另一種河流——同在東洋廠家工作的“外頭工人”們匯在一起。但是，住在這地域附近的人，對這河流里面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外頭人的衣服多少的整潔一點，有人穿著旗袍，黃色或者淡藍的橡皮鞋子，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們有時愛搽一點粉，甚至也有人燙過頭髮。包身工，就沒有這種福氣了，她們沒有例外的穿著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髒了的湖綠乃至青蓮的短衫，下面是元色或者柳條的褲子。長頭髮，很多還梳著辮子。破髒的粗布鞋，纏過而未放大的腳，走路也就有點蹣跚的樣子。在路上走，這兩種人很少有談話的機會。髒，鄉下氣，土頭土腦，言語不通，這也許都是她們不親近的原因。過分地看高自己和不必要地看輕別人，這在“外頭工人”的心里也是下意識地存在著的。她們想：我們比你們多一種自由，多一種權利，——這就是寧願餓肚子的自由，隨



时可以調厂和不做的权利。

紅磚头的怪物已經張着嘴巴在等待着它的滋养物了。印度門警\* 把守着鉄門，在門房間交出准許她們貢獻劳动力的憑証，包身工只交一本打印子的簿子，外头工人在这簿子之外还有一張粘着照片的入厂憑証。这憑証已經有十一年的历史了。顧正紅事件之后，内外棉搖班(罢工)了，可是其他的东洋厂还有一部分在工作，于是，在沪西的丰田厂，有許多内外棉的工人冒混进去，做了一次里应外合的英勇的工作。从这时候起，由丰田厂的提議，工人入厂之前就需要这种有照片的憑証了。——这种制度，是东洋厂所特有的，中国厂当然沒有，英国厂，譬如怡和，工人进厂的时候还可以随便地带个把亲戚或者自己的兒女去學習(当然不給工資)，怡和厂里随处可以看見七八岁甚至五六岁的童工，这当然是不取工錢的“贈品”。

織成衣服的一縷縷的紗，編成袜子的一根根的綫，

---

\* 印度門警：那时候上海許多帝国主义国家經營的洋行、工厂等，都用印度人做門警。因为那时候，印度也是被侵略的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就利用他們的特权，奴役了一部分印度人为他們服务。